

龚琳娜 自由是美丽的

从前的龚琳娜走的是“小清新路线”，人们绝不会想到，若干年后，她居然以夸张滑稽的风格红遍大江南北。但这些只是表面上的龚琳娜。读过其新作《自由女人》就会明白，从“小清新”到“神曲女王”，绝非简单转型，而是一次次人生抉择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资料



什么是美？自由地歌唱是美，与自然融为一体是美。要把心打开，完完全全打开的样子，在她看来才是美。因为自由是美丽的。

坚持真唱像打了三年多的仗

在德国生活六七年后，龚琳娜回到中国。起初她非常不适应。“专场音乐会很少，邀请多来自晚会。”大量晚会养成了大量“晚会歌手”。通常，一个歌手带一两名助手或化妆师，拿着伴奏CD，就可唱遍天下。龚琳娜却要求乐队现场伴奏，加上助理、化妆师、调音师，不下十来人。每次彩排，晚会歌手十分钟搞定，龚琳娜却要花两个小时。

“这么庞大的队伍、这么高的技术要求，只为一台晚会中的两首歌，主办方愿意接受吗？”2010年龚琳娜已凭借《忐忑》蹿红，即便如此，顽固的坚持仍使她失去了大把机会。

“并非主办方不肯花钱，而是他们压根儿没法理解。”龚琳娜说。最常见的疑问是：“你们为什么非用乐队啊，有必要吗？”按照通行的做法，一张伴奏CD包打天下，还能保证演出效果。仅仅是这个问题，龚琳娜和老锣就要和主办方反复拉锯，“谈崩了”是家常便饭。

讨论到演唱环节，又有人打退堂鼓。主办方认为假唱没什么大不了，还能保证演出效果，“真唱要出了问题怎么办？”老锣回敬道：“真的永远比假的有力量。”

老锣那种德国人的“拧劲儿”，有时候连龚琳娜都觉得过了，希望他稍作妥协。老锣则我行我素，不留任何余地。他也因此成为很好用的“挡箭牌”。每当主办方抱怨，龚琳娜就搬出老锣：“德国人就是这么严谨、就是这么坚持，没办法！”

2012年，在央视的邀请和建议下，龚琳娜从家乡贵州挑了二十几个有唱歌天赋的年轻人，组成“大白嗓合唱团”，参加公益活动《梦想合唱团》。

他们的精益求精令央视领导颇感头疼。为实现最佳效果，龚琳娜要给每个合唱团成员和每件乐器都配备麦克风，大调音台要有30多条音轨。这已超出预算。协调的结果是：电视台出钱租调音台，龚琳娜出钱租麦克风。表演那天，“大白嗓合唱团”将《好汉歌》演绎得气势恢宏，名列首位。此后，央视主动承担了麦克风的租金。

“必须干得漂亮，电视台才会相信我们，支持我们去真唱。”龚琳娜说，他们为此奋斗、争取，“像打了三年多的仗，碰撞、内耗，如噩梦般痛苦。”所幸，口碑日积月累，圈内都知道，龚琳娜是“说真的，唱真的，玩真的”。

青春痘的茁壮源自内心的焦虑。

龚琳娜并不讳言自己也做过晚会歌手。

十多年前她还是中央民族乐团的青年歌手，恰逢民乐市场开始走上坡路，演出频

繁。在《自由女人》一书中她描绘当时的节奏：“每天奔波在不同的城市，参加形形色色的晚会。”晚会不需要个性，对口型、假唱属家常便饭，连服饰也定死了。

“脚蹬细长高跟鞋，蓬蓬裙简直能铺开半个舞台。”龚琳娜将此归纳为“民族演唱三宝”：美妆、华服、高跟鞋，一样不能少。“目的是要歌手炫耀年轻貌美和嗓音技巧。”

在音乐学院，龚琳娜的嗓音条件并不被看好。声乐老师的评价是：“山歌嗓，野的。”她必须以宋祖英、张也为标准。为了弥补“嗓音缺陷”，龚琳娜拼命学技巧，并获得老师赞许。至于容貌，她倒没担心过：“我不算漂亮，但充满阳光和自信，知道怎样吸引男人的注意力。”和那些年轻女歌手相同，龚琳娜身边不缺乏追求者。

“那时我最关心今天美不美？有没有变胖？裙子漂不漂亮？表情好不好看？”成名后网友挖出了一张旧照，只见她白纱飘飘、妆容淡雅。“龚琳娜也曾经是小清新啊！”大家感叹。“其实我二十来岁时脸色蜡黄，而且满脸青春痘。只不过被妆容掩盖了。”

“走穴、假唱、挣钱……这份工作很稳定，稳定到我不必动脑筋就能看到五十年后的自己。”师长、同学、同事都告诉她，沿着这条道走下去，就能抵达幸福。她却日益困惑：“为什么我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？”

龚琳娜初次登台时5岁，1980年，独唱《我的愿望》：“我有一个愿望，长大当个歌手。”她的愿望是成为李谷一。7岁考入贵阳“苗苗艺术团”，周末去少年宫唱歌，假期下乡演出。初三听彭丽媛的硕士音乐会流泪，以之为偶像。199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，后直升中央音乐学院。1999年以文化部“民歌状元”称号毕业，旋即加盟中央民族乐团。

“我从小爱唱歌，因为那让我快乐。可是工作以后，我越来越痛苦。”龚琳娜说，整天假唱令她倍感空虚，而晚会歌曲的贫乏空洞，使她作呕，“不仅心理上，生理上也真的有反应。”后来她练就一番绝活——用麦克风挡住嘴，一边按节奏数“一二三四”，一边将表情做足。“放的都是录音，但我演得跟真唱似的，反正观众看不出来。”

没有规矩和技巧只有表达

2002年春，龚琳娜和弹古筝的常静组成“知音琴歌”，想做些真正喜欢的音乐。有天晚上，两人去三里屯某酒吧看演出，乐队里一个老外吸引了她的目光。“他弹一件西方民族乐器，挺像古筝的。”演出结束后常静前去询问，老外用中文回答：“巴伐利亚琴，德国民间乐器。”他叫Robert Zollstich，中文名取谐音“萝卜头”。后来，龚琳娜管他叫“老锣”。

次日龚琳娜赴连云港演出，依然是假唱。不知怎的，老锣演奏时的那种专注、真诚频频闯入脑海。“而我，只有伪装和欺骗。”回到宾馆她嚎啕大哭。

改变却不容易。“我不想跟别人一样，又不知道怎样做才能不一样。”接受了十几年科班训练，从音色、表情、服饰到审美，龚琳娜都被标准化了。“大家认为对的、美的，我也认为对的、美的。”她迫切地想弄明白：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她去找了老锣。

和老锣排演龚琳娜倍感愉悦。后者的理念是“玩”，歌者可即兴发挥，他的音乐会跟进。“反正是老外，放开了唱吧！”龚琳娜先唱了首陕北民歌《三十里铺》，前所未有的畅快。她逐渐抛掉了规矩、技巧，甚至现编词，声音变化越来越多。老锣的和弦随之丰富，又用喉头发出蒙古族的“潮尔”音色。他们足足唱了三个钟头。

回国前老锣透露，每年七月初，德国会举办世界音乐节，邀请各地的民族音乐家来演出。作为评委会主席的他邀请龚琳娜来听听。2002年6月，龚琳娜从北京飞往慕尼黑。那是她首次独自出国，此前，她和老锣相处的时间加起来也没超过48小时。

老锣租住在巴伐利亚森林深处的一栋小木屋里。龚琳娜惊奇地发现，他的家具普遍“又重又大”——炒菜的铁锅双手都提不动，吃饭的黑陶碗捧久了手酸。老锣的解释是：“你用的物品有重量，才能感觉到生活的质量。”

7月，老锣带龚琳娜来到小城Rudolstadt，参加一年一度的音乐节。“完全颠覆了我的观念。”龚琳娜回忆。这儿的歌手衣着普通、妆容素朴，不管年幼年长、高矮胖瘦，只要唱得动听都受欢迎。保加利亚合唱、法国香颂、葡萄牙法朵……“没有假唱，都是真唱；没有伴奏带，都是现场乐队；没有表演，都是表达。”龚琳娜找到了自我。

神曲打开了所有的门

相恋两年多，龚琳娜和老锣在德国注册结婚。随后她连生了两个男孩子。“有的人为了嗓子不吃饭、不结婚、不要孩子，我可做不到。”她主张顺其自然。

老锣一家住山上，没电视、没电脑。“每天的生活就是上山下山，看牛看马，看天看云。”龚琳娜借机学唱各地民歌。带孩子散步时唱，当摇篮曲。坐半山腰看夕阳时唱，听声音随山地起伏。她悟出了民歌的起源：“从前的人用歌曲讲述日常生活，耕织、劳作、相爱、生老病死，不为表演，只为自由表达。”她已完全无法接受中国式的“民族唱法”。

期间，老锣为龚琳娜写了不少作品。2006年专辑《走生命的路》发行，其中有《忐忑》。它曾荣获欧洲人设立的“聆听世界音乐奖”。